

唐通事教材對於古典小說與善書之接受： 以江戶時期（1603-1867）《鬧裡鬧》、《唐話長 短拾話》、《唐通事心得》為中心

許麗芳*

摘 要

本論文分析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唐通事教材對古典小說與善書之接受現象。當時的唐通事教材具有明顯的口語特徵與通俗內涵，此實與古典小說與善書關係密切。既有研究已關注其中語音或敘事現象等，本文則於既有基礎上，分析《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對於中國筆記小說、話本小說與章回小說之承襲與相關意義，分析範圍包括唐通事教材沿襲白話小說之口語特徵、對文言或白話小說情節剪裁改寫之敘事現象，並藉以傳輸的庶民倫理關懷，以及所觸及的有關小說與善書之互動內涵，本文關注這些敘事形式與價值觀點之承襲與唐通事學養之關聯，藉由相關比對分析，以期理解透過傳播與模擬，文學文本在異國的接受現象與可能意涵。

關鍵詞：唐通事，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古典小說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唐通事教材為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中日通商的時代產物，日本於1604至1867年間在唯一通商口長崎設立唐通事以擔任翻譯工作，相關的語言教育與通事教材也於此一時空背景產生。¹這些教材並無固定版本，皆通事抄寫而習之。²教材來源除儒家經籍外，也包含通俗文學，同時也有入門與進階之別。³在此同時，明清小說商品化與流通普遍使得古典小說與唐通事教材具有相當程度關連。⁴尤其白話小說的生活化口語，成為唐通事學習唐話的重要材料⁵，也成為影響唐通事教材之書寫形式與價值觀點之主要依據。

另一方面，江戶時期，善書輸入日本的時間較白話小說早，且往往是由日用類書中被

¹ 日本於1604至1867江戶年間在唯一通商口長崎設立唐通事，其後薩摩藩等地亦有設置，負責與中國進行貿易時的翻譯工作。通事有按察通事、大通事、小通事、學通事(即稽古通事)、唐年行司及內通事等職級，據日本仙台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本《瓊浦佳話》卷一與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卷3期(1999)，頁461-464。

² 轉引自〔日〕六角恆廣著，王順洪譯：《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據長崎通事盧篤三郎自傳，唐通事教材從《二字話》、《三字話》始，還有《瓊浦佳話》、《譯家必備》、《醫生通話》等，此等書無版本，皆自己抄而習之。

³ 據〔日〕武藤長平：〈鎮西の支那語学研究〉，《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7)，頁51-2，唐通事最初讀《三字經》、《大學》、《論語》、《孟子》、《詩經》等學習唐話發音，其次學習如「恭喜」、「多謝」、「請坐」等二字話，以及如「好得緊」、「不曉得」、「吃茶去」等三字話，進而學習四字以上的長短話，此類教科書有《譯詞長短話》五冊、《譯家必備》四冊、《養兒子》一冊、《三折肱》一冊、《醫家摘要》一冊、《二才子》二冊、《瓊浦佳話》四冊等由唐通事所編輯之書本。進階讀物有《今古奇觀》、《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等，以及《福惠全書》、《資治新書》、《紅樓夢》、《金瓶梅》等。又據〔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頁14，唐通事的教科書最初由《三字經》、《大學》、《論語》、《孟子》、《詩經》等學習發音，其次背誦二字、三字及長短話等常用語彙，進而學習如《譯家必備》、《養兒子》、《三折肱》、《醫家摘要》、《二才子》、《瓊浦佳話》、《兩國譯通》等由唐通事編輯之書，並學習《今古奇觀》、《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等，以及《福惠全書》、《資治新書》等。其他教科書有《俗語彙編》五卷、《譯官雜字簿》、《華語詳解》及〔日〕岡島冠山所編《唐話纂要》、《唐語使用》等入門必讀書。

⁴ 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的兩百六十餘年，正是明清時期小說創作最盛之時，明朝嘉靖(1522-1566)到清朝雍正(1723-1735)，印刷術的發展促進小說商品化與傳播速度，小說之生產趨於繁榮，大量小說作品因而傳入當時日清貿易的唯一通商港口長崎。江戶時期漢籍之傳入日本主要是透過往來中日的商船，中國當時的出版業以南京、蘇州、杭州為中心，而從事書籍運輸商船貿易的商船則多為寧波船與南京船，就地理環境與航行距離以觀，到北京與到長崎的距離大致相等，此一促成小說等書籍之輸出。參見宋荊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2004)，頁340。引〔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62。

⁵ 如〔日〕兩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話》，(大阪府文榮堂，出版年不詳)，卷一，所據為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書籍綜合電子資料庫，「我東人欲學唐話，除小說無下手處」「或曰：學唐話，須讀小說可乎？曰：可也。」即意識到小說對於學習唐話有實質幫助。

認識。⁶所謂善書，即是強調因果報應、勸人去惡從善的通俗教化書籍，⁷江戶時期除了既有傳入的儒學典籍外，也接受了南宋開始至明代的庶民文化，包含代表庶民文化的日用類書、善書與小說等。此一傳播的過程往往是先藉由學者、文人的翻譯或改編，以至注釋與翻刻全書，或為之寫序。⁸唐通事也參與此類通俗作品的翻譯與注釋等工作，如享保三年[1716]長崎通事俞直俊「欲助人之善意而獻醜，述淺陋之見」，「以和字翻譯《感應篇》，並將其雕梓，欲廣施童蒙女子，令其修習」，因而刊行《太上感應靈篇》同時翻譯出版《譯語太上感應篇》，主張善書的道德文化對庶民婦孺具有教化陶冶之功。⁹而唐通事教材也具體呈現了此一思考與期待。

歷來研究多關注唐通事教材語音與敘事等特質，¹⁰本文則以不同時空文化的交流與影

⁶ [日]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波及江戶時代日本文化的中國善書的影響與流通〉，《中國善書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增補版下卷，第九章，頁767，寬文十三年翻刻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明刻版（嘉靖三十九年由田汝成、洪方泉刊）中，其中「祭集·謹身」條中引用了《太上感應篇》與《勸善錄》，而元祿十二年翻刻的元代《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中也有《訓誠嘉言庚集》四卷與《治家規則庚集》五卷，雖是通俗書，然價值觀點卻更接近儒學書，如寬文八年左右，《太上感應經》即被翻刻，江戶中期後，長崎出版了一般大眾易懂的《倭解感應篇》，又復刻元祿時代所流傳下來的《感應篇圖說》，並創作日文解讀本，同時復刻袁黃《陰騭錄》與祿宏的《自知錄》，並在京阪推廣，擴大流通傳播規模。

⁷ 萬晴川：〈明清小說與善書〉，《中國典籍與文化》1期（2009），頁29-30，所謂「善書」，是以因果報應的說教方式宣傳倫理道德、勸人去惡從善的通俗教化書籍，簡稱善書，民間又叫「勸世文」或「因果書」。宋代有對後世影響甚大的《太上感應篇》，金元時期則有無名氏的《太微仙君功過格》、《文昌帝君陰騭文》等。

⁸ [日]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波及江戶時代日本文化的中國善書的影響與流通〉，同註6，頁736-737，753。慶長（1596-1615）、元和（1615-1624）以後，由中國、朝鮮傳入的漢籍被翻刻或譯成日文，其中也包含庶民文化代表的日用類書、善書與小說等。享保三年（1718）長崎之俞直俊刊行《太上感應靈篇》同時翻譯出版《譯語太上感應篇》，其中西川如見（1648-1724）有〈譯語太上感應篇贊論〉，其為長崎人，跟隨寬文十二年到長崎的京都學者南部草壽學習，並與林吉左衛門、小林信義等學習天文曆數。而為《譯語太上感應（篇）》寫序的東野閑人，則為荻生徂來門生江戶人安藤東野，具有儒學背景，在長崎學習唐音，與從事唐話與白話小說的代表人物岡島冠山為師友，並為其《唐話纂要》寫序。西川如見另著有《增補華夷通商考》二卷（元祿八年，1695刊，寶永五年，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增補五卷）其中卷二〈唐船役者・記漳州之詞〉中載有中國商船乘員組合。

⁹ 同前註，頁770-774。據林云瞻〈跋太上感應靈篇〉云，「直俊俞先生，崎陽善士，奉是篇誠而有年，……戊戌秋特將其原本加譯付梓，乃公諸國之人之心。」據書末署名及印章可知，俞直俊是中國名，日本名姓為河間直俊。又據西川如見（1648-1724）之〈譯語太上感應篇贊論〉，俞直俊為當時長崎通事，「今歲為享保三年長崎清客館之通事河間直俊，以和字翻譯《感應篇》，並將其雕梓，欲廣施童蒙女子，令其修習，成不讓仁人之志，豈非尤為神忠乎？由是，吾雖不才，因欲助人之善意而獻醜，述淺陋之見」。

¹⁰ 既有研究文獻如[日]石田義光：〈小說瓊浦佳話解題〉，東北大學《圖書館學研究報告》第一號（1968），主要為作者身分與使用語音等考釋。[日]いしるのぞむ：〈大浦天主堂藏唐文禁教榜辨釋〉，發表於「第三回長崎純心比較文化學會」，2009年5月16日，論文中雖提及《瓊浦佳話》，然僅做為相關釋例，並非論述重點。[日]喜多田久仁彥：〈唐通事の教本について—《小孩兒》《養兒子》の教本としての特徴〉，京都外國語大學，《研究論叢》LVIII（2001），則就其教學特徵加以研究，林彬暉：〈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6卷5期（2007），頁46-52，已意識到此類教材與中國小說的關係，其中並提及《養兒子》運用韻文與說話人等形式特徵，但並非專論。廖肇亨：〈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探析〉，收錄於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三輯，頁201-224，針對《唐通事心

響角度，思考江戶時期唐通事教材接受所謂異國文學或文化之相關對應與反省，分析古典小說與相關善書對於唐通事教材之影響。¹¹唐通事教材固然有入門與進階之別，學習取向因而有所差異偏重，如《鬧裡鬧》即為年幼學習者所編；而《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為中階教材，對於理解歷史文化、商務與人情事理已有所注重。¹²然而，對於古典小說或善書之運用，則各有表現。

然既有研究卻尚未有系統研究，因此，本文即以《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等教材為中心，分析唐通事教材沿襲白話小說之口語特徵、對小說情節剪裁改寫之敘事現象，藉以傳輸的庶民倫理關懷，以及所觸及的有關小說與善書之互動內涵，理解這些教材對於古典小說與善書形式內容之承襲與轉換，並關注這些敘事形式與價值觀點之承襲與唐通事學養之關聯。

唐通事教材《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彼此結構各不相同。《鬧裡

得》分析通事的國家認同與區域意識，其中也提及通事教育書目與技藝訓練等，但全文主要著眼於通事在國家與文化衝擊下，所產生的道德期待與文化想像之層面知識結構與道德價值，針對通事之養成背景加以分析，亦以〔日〕岡島冠山《唐話纂要》中的〈德容行善有報〉為例，分析明清小說對於通事語言學習之影響，並提出以道德關懷合理化或美化經貿活動與商人行止等。〔日〕奧村佳代子：〈唐話類纂考：他資料との關係から〉，關西大學《アジア文化交流》第四号（2009），就《唐話類纂》各卷的二字至六字等語彙加以整理比較，凸顯其編纂特色，並見其於《唐話纂要》進至《唐音雅俗語類》、《唐譯便覽》、《唐話便用》的出版過程中之特色，其他如〔日〕奧村佳代子：〈唐話資料の二面性—内の唐話と外の唐話〉，《或問》6期（2003），頁95-107。〔日〕木津祐子：〈「官話」の現地化：長崎通事書の二重他動詞「把」と琉球通事書の処置文〉《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2012年51號（2012），頁129-147。〔日〕紅粉芳惠：〈近代以前の日中語言学学習書から見る中国語教授法〉，關西大學《アジア文化交流》第四号（2009），頁263-275，聚焦特定時期中文與日文教材中相關二字話乃至四字話或成語語彙的編寫概念與教授方式，尤其著重特定語彙中的文法結構。林慶勳：〈域外漢語探索：論長崎唐話的表現特色〉，中興大學中文系《興大中文學報》37期（2015），頁267-302，關注長崎唐話之語音特色，林慶勳：〈長崎唐話教本及其反映的唐人庶民生活—以唐與唐三寺互動為對象〉，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歷史與海洋文化》（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頁19-42則為語言與歷史之研究。有關唐通事教材之形式特徵與倫理關懷，則有許麗芳：〈長崎唐通事教材《瓊浦佳話》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學誌》20期（2010），頁65-85。許麗芳：〈日本江戶時期唐通事教材《養兒子》與《小孩兒》的口語特徵與倫理關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海洋文化學刊》10期（2011），頁25-52。

¹¹ 本文所謂「影響」，乃據劉介民：〈附錄〉，《比較文學方法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0），頁659，「影響研究」，影響主要指一國的作家在外國作家或作品得到某種啟示、模仿、消化其中一些原先自己沒有發現的新的因素，包括文學思想、作品的主题、題材、語言表達、寫作技巧等，並融入自己的作品。

¹² 如林慶勳：〈長崎唐話中對寬文二至四年（1662-1664）伊東走私事件敘述差異的探討：江戶時代唐通事養成教材研究之二〉，《東亞漢學研究》（長崎：東亞漢學研究學會，2014），第4號，頁273，以為「伊東走私事件」的記載，見於篇幅稍長的三本唐話教材，即《瓊浦佳話》、《長短拾話唐話》及《唐通事心得》。該三書屬於中級程度唐話學習教材，與給年幼學習者所編如《小孩兒》、《鬧裡鬧》等書有很大差異。因為初學唐話，對語言、文化甚至實務的唐船貿易等事務瞭解有限，毋須太早編入教材學習，頁275比較《瓊浦佳話》與《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對伊東走私事件描述差異時以為，「至於擬話本小說體的《瓊浦佳話》，敘述就完全不同，它像說故事一樣，一五一十把伊東的事件本末及許多細節，都做了詳細的交代，讓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這是擬話本小說寫作的本質，無可厚非。」

鬧》全文約八千字，由三大部分組成，寫本，寫作年代不明，然根據本文判斷，因內容有改寫自順治年間刊行的《蝴蝶媒》的遊虎丘故事，又據日本寶曆甲戌（1754，清乾隆十九年）刊《舶載書目》著錄《蝴蝶媒》一書，則《鬧裡鬧》之寫成時間應於1754年之後。¹³

《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二書則屢見重出段落，《唐話長短拾話》約一萬四千字，寫本，以四十則左右之朋友親族對話或事理說明段落所組成，年代不明，書末署有「嘉永三年庚戌五月穀旦」之抄寫時間；《唐通事心得》結合各段論理說明文字，約有六千字。既有研究以為，因有旭如和尚之談話，則知不早於1711至1727年間寫成。而《唐話長短拾話》則有所謂六十年前即寬文七年[1667]發生的伊藤小作左右衛門走私武器事件之記載，或可做為寫作時間之參考。¹⁴然根據本文判斷，《唐話長短拾話》有改寫小說《好速傳》與《醒世姻緣傳》之段落，日本國會圖書館藏《舶載書目》記載享保十三年[1728]進口《醒世姻緣傳》，享保十六年[1731]傳入《好速傳》，則知《唐話長短拾話》寫成時間或應於享保十六年之後。¹⁵

《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對於古典小說之吸收運用較其他唐通事教材更為明顯，也各有側重。¹⁶本文所謂古典小說，取材來源包括文言筆記小說、話本小說與章回小說，接受現象則有剪裁拼接之有意安排，傳輸的庶民倫理關懷也觸及小說與善

¹³ 據石昌渝：《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頁131，《蝴蝶媒》當刊行於順治年間。又據羅炳良校點《蝴蝶媒》說明，日本寶曆甲戌（1754，〔清〕乾隆十九年）刊《舶載書目》著錄此書，則知寫成時間當於此時之前，見殷國光、葉君遠主編：《明清言情小說大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中冊，頁645。

¹⁴ 據〔日〕奧村佳代子：〈唐話資料の二面性—内の唐話と外の唐話〉，《或問》，2003年6期（2003），頁99-100，與〔日〕木津祐子：〈「官話」の現地化：長崎通事書の二重他動詞「把」と琉球通事書の処置文〉，《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51號（2012），頁136，《唐通事心得》記錄正德元年至享保三年（1711-1718）長崎唐僧之逸事。則最早不超過1718年寫成，現藏於長崎縣立長崎歷史博物館，而與《唐通事心得》內容程度雷同的《唐話長短拾話》則有所謂六十年前即寬文七年[1667]發生的伊藤小作左右衛門走私武器事件之記載，或可做為寫作時間之參考，現亦為長崎縣立長崎歷史博物館所藏。

¹⁵ 據石昌渝：《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同註13，頁451-452，此書弁語署為「辛丑」，又據第四十九回內容提及秦良玉於天啟至崇禎年間（1621-1630）事蹟，第三十一回提及濟南守備道李粹然之事，二者皆不晚於崇禎初年，且日本國會圖書館藏《舶載書目》記載享保十三年，即清雍正六年[1728]進口《醒世姻緣傳》一部十八本，則成書年代非萬曆二十九年辛丑（1601）或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而可能為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又〈《好速傳》校點說明〉，見殷國光、葉君遠編：《明清言情小說大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上冊，頁2，據康熙、乾隆年間人夏二銘《野叟曝言》云，「《好速傳》版清紙白，前首繡像十分工致」，可知應於清初或明代即已刊行。又據〔日〕大庭修，〈江戸時代唐船渡書の研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叢刊》，1967，日本國會圖書館藏《舶載書目》記載享保十六辛亥年（1731）傳入《好速傳》一部四本。

¹⁶ 如〔日〕岡島冠山：《唐話纂要》卷六〈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尚有經營故事情節之意識，而《瓊浦佳話》亦尚有當代史實的若干紀錄，具有某種程度的敘事傾向，至《養兒子》與《小孩兒》等通事教材則已忽略情節安排之構思，而是根據當代相關人事加以記錄直書，見許麗芳：〈日本江戶時期唐通事教材《養兒子》與《小孩兒》的口語特徵與倫理關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海洋文化學刊》10期（2011），頁25-52及許麗芳：〈長崎唐通事教材《瓊浦佳話》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學誌》20期（2010），頁65-85。

書的互動內涵，相關形式與內容之承襲亦與唐通事學養要求有所連結，是以藉由相關文字或段落之比對分析，或可理解不同區域不同文化間，有關文學文化的傳輸與可能意涵。

二、拼接改寫的取材表現

唐通事使用的語言為當時所謂「唐話」的中國白話，學習教材雖由漢字寫成，但強調白話口語，故自成系統，與文言的儒學教育有所不同。¹⁷此時的唐通事教材不僅與中國漢文相關，也與傳入日本的中國古典小說密切關聯，如江戶中期儒者岡島冠山（1674-1728）曾編譯《忠義水滸傳》做為唐話學習教材，並模擬創作〈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兩篇話本小說，即是藉此類白話小說之內涵與形式進行教材編寫。至於《瓊浦佳話》則以白話小說形式描繪實際長崎的通商歷史人事，形式上有所模擬，題材卻為現實史料，對小說之模擬互有異同。¹⁸

《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對古典小說之接受現象則有所不同，主要是改寫特定小說之若干情節成為完整故事，或根據已有文字敘述擴充成為更具情節之故事，以及藉由兩個不同故事段落加以拼湊，成為另一創新故事，而改編過程中亦多強調長崎通商與唐通事身份等時空背景，顯然為有意的安排，因而形成明顯的書寫特徵。

（一）擷取情節、另立敘事時空

如《鬧裡鬧》敘述潮州人遊虎丘時於澡堂中被訛騙一則，實即節錄自章回小說《蝴蝶媒》之段落，其文云：

當初，潮州人到蘇州地方，有一日不帶主子，獨自一個到虎丘山去看千人石，這個虎丘山，是當初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所在了，原是好地方，出名的古蹟了。所以但凡人家初到蘇州來，定要這地方去遊頑一回。當日那潮州人在虎丘頑耍了半日，回到城裡，忽見一個浴堂，說是裡頭有絕精的香水，今日新開的，

¹⁷ 林彬暉：〈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6卷5期（2007），頁46-47。以為唐通事所學習的中國白話即唐話，並非當時儒學文獻所使用的文言文書面語，其人乃以訓讀法閱讀，所謂「不識中國音，卻認中國字」，而通事因翻譯職務所需，學習取向有所不同。

¹⁸ [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弘文堂，1940），頁73-76。

許多人去洗澡。那潮州人那一日轉灣（彎）抹角，¹⁹轉過了許多灣（彎），多走幾里路，覺得有些倦了，心裡要去洗浴。走進浴堂去看，那浴堂裡頭果然潔淨。每人名下一個衣櫃，衣櫃上編做號數，又有一根二寸來長的號籌拴在手巾上，但凡是洗了浴出來的人，那掌櫃的驗了號籌，開了衣櫃，交把衣服，再不得差錯。

當下潮州人脫了衣服，拿毛巾和號籌，走進浴池裡。那浴池內香水初熱，好不爽快。洗了半晌，旁邊有一個人對潮州人說道：「大叔，我替你洗洗脊背。」潮州人道：「這是極妙的事情，但是不曾相與過的，不敢勞動你。」那人道：「這何妨，洗了你的，輪一遞一手，我的背也要勞動你洗一洗。」說罷，不管他肯不肯，就去洗背。那人道：「我這毛巾不知那個洗過的，有些孤臭。」潮州人聽見，忙將自己的手巾遞與那人，道：「我這條手巾還乾淨，著實替我洗洗。」那人接到手巾，替他洗了一會。口裡不住的說道：「好水，有趣。」不想那人早已把自己的號籌抵換了。

這潮州人那里（應作裡）留心，還在水裡打滾燙著哩。那人捏著手巾、號籌，故意說道「好水！我去小解來，再洗一洗。」說罷，連忙走將出來，把號籌交把掌櫃的看了，那掌櫃的驗過了號籌，開了衣櫃，把潮州人的衣服穿在身上，拖了鞋子，其餘的零碎捲在一處。挾著在脇腋下，急急忙忙打發了浴錢，飛奔也似往外頭去了。

後來潮州人悄悄停停走出來，看自己的衣櫃大開在那里（應作裡），裡面空空的。驚得目睜口呆，對掌櫃的亂嚷道：「不好了，你錯開了我的衣櫃，交把別個。我的衣服銀錢都被人拐去了。」掌櫃的說道：「客人，這個話從那里（哪裡）說起的，我這里（裡）來千去萬的，那里（哪裡）留心，管得這許多事。況且這衣櫃上都是有號數的，又有號籌拴在手巾上，驗籌開櫃，原來認籌不認人，我自己再不錯。除非那是你不小心，在浴池裡被人換了號籌，替我掌櫃的說也無干。」

潮州人聽見這話，忙看自己手中的號籌，正是先前那人的號籌，方纔曉得擦擦

¹⁹ 本文引用之唐通事教材原文儘可能忠於原書寫文字，有錯別字疑慮處，另以括弧標註可能的正確文字，下文不贅釋。

背的時節，被他換了去。心裡氣不過，氣得捶胸踢腳，又不好對人說得，只得叫掌櫃的開了那人的衣櫃，一看，那個衣服腌腌臢臢，稀破在那里（裡），開了衣櫃，十分稀臭，那臭氣難當，沒奈何，把破氈帽、破袖襖、爛草鞋和一條虱子累累堆堆、有襠沒要（腰）的褲子穿在身上，氣憤憤回去。剛要走出浴堂，那掌櫃的趕上了一把揪住問他要浴錢。

這潮州人原來有兩分家當的，所以起先出門的時節，荷包裡有幾兩零碎銀子，這時節，一個財主變作化子。腰裡那有一文錢，被那掌櫃的咬了幾口，走出浴堂。好生去腦（氣惱）。到了門外，四下張望一回，不見那人的影響，只得回去。一路上想說道：「單單把銀子被他偷了去，還有嘴臉回到寓所見個家主人。如今這個模樣，弄得乞兒一般，不成體統。怎地見人家？」一路上把手遮了臉，見了人只顧躲開在一邊，三腳併作兩步走。身上的衣服又臭，渾身的虱子又走動，偏生來往的人又多，越想越氣，氣得那潮州人只把肚皮來抓。

此段故事實出自南嶽道人所編《蝴蝶媒》第九回〈贈寒衣義女偷情，看花燈佳人密約〉之情節，文字幾無二致。²⁰敘述蔣青岩主僕至蘇州被騙銀兩後，僕人院子有意為主緝訪騙子，卻反再被騙；《鬧裡鬧》中騙子於浴堂藉口幫忙洗背，將院子毛巾號籌更換，蒙騙掌櫃開衣櫃而竊取衣物，院子無奈之餘被迫穿上騙子留下的骯髒衣物，卻又遭遇掌櫃追討浴錢等情節文字敘述與《蝴蝶媒》完全相同。

不同的是，《鬧裡鬧》將小說中為主人緝訪騙子的僕人院子改為潮州人，遊虎丘及去浴堂的動機不同，面對被騙之後的懊惱也有所差異，《鬧裡鬧》以潮州人沒臉見家主與滿腹怨氣作結，而《蝴蝶媒》則敘述院子又氣又惱，最終放聲大哭，其文云：

這院子好生氣惱，走出浴堂門外，四下張望一回，不見那人的影響，只得回虎丘寺去。一路想道：「自己積了許久，積得幾兩銀子，都被他騙去了。」身上的衣服又臭氣渾身，蟻風走動，心中越想越苦，到了半塘寺前一塊空地上坐著，傷心痛哭了一場。又想道：「我在主人跟前說的響噹噹的，要拿騙子，於今騙

²⁰ 《蝴蝶媒》一名《鴛鴦夢》、《鴛鴦蝴蝶夢》、《蝴蝶緣》，全書四卷十六回。題「南嶽道人編」、「青溪醉客評」，別題「步月主人訂」。編者與評訂者之生平均不詳。現存《蝴蝶媒》各早期刊本均未標明刊行年代。日本寶曆甲戌（1754，清乾隆十九年）刊《舶載書目》著錄此書，據此知《蝴蝶媒》初刊不晚於乾隆初年。

子不曾拿得，自己到變成一個花子了，怎生回去見主人？」²¹

院子「主人跟前說的響噹噹的，要拿騙子，於今騙子不曾拿得，自己到變成一個花子了，怎生見主人」的懊惱亦為《鬧裡鬧》所著墨敘述，仍強調潮州人身為家僕之背景，所謂「有一日不帶主子，獨自一個到虎丘山去看千人石」，「單單把銀子被他偷了去，還有嘴臉回到寓所見個家主人。如今這個模樣，弄得乞兒一般，不成體統。怎地見人家？」顯然具有沿襲之跡。

院子於浴堂被騙之情節實為《蝴蝶媒》插曲，相關人事與情節事已有前文脈絡，故無須刻意強調，《鬧裡鬧》則將《蝴蝶媒》中主僕於蘇州相繼被騙的插曲改為獨立故事，並強調故事來自當事人之陳述，所謂「後來這個人到東洋來做生意，那一年我還做職事，在館裡見他的時節，把這遇著騙子的話，說把我聽」，顯然運用通事教材之時空背景做為敘事框架，說明故事來源乃因潮州人日後到東洋做生意，故得以向曾任職事的敘述者親口陳述自身被訛詐的經歷，《鬧裡鬧》之改寫既符合當時唐通事與中國商人溝通互動的時空背景，也呈現對古典小說吸收修正的現象。

（二）改編情節、別具批評角度

至於《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則記載和尚說法勸人，卻僅因鉢被打破而勃然動怒，其中有關和尚之於鉢的態度，亦前有所承，其文云：

這樣品行好，所以這個朋友十分歸依他，當下看見這個和尚來連忙出來迎接，請他客廳來坐，請他吃早飯，買了幾樣時新好素菜，安排幾碗，十分管待。那個和尚沒有推辭，儘著食量吃飽了。後來一頭吃茶，一頭把滿家中的內眷們都叫攏來，講經把他們聽。和尚說道：「貧僧如今勸你們一句好話，大凡做一個人，不論僧家俗家。要戒煩惱，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不要多煩惱」，那時節，他家裡大兒子把和尚所托的鉢盂，劈手搶奪了，一拳打碎了，那個和尚看見這個光景，沸翻應天，亂說亂罵，大惱起來。那兒子說道：「師父剛纔勸我們不要煩惱，這一句說話，說也還說不完，《唐通事心得》作：說也不曾說的完），為什麼自己（《唐通事心得》作：為什麼自己不警戒，這樣大

²¹ [清]南嶽道人編：《蝴蝶媒》，收於殷國光、葉君遠編：《明清言情小說大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中冊，頁698。

惱) 這樣大惱？」和尚回覆道：「別樣事可以忍耐得(《唐通事心得》作：別樣事情可以忍耐得住)，這個鉢是我的性命了，(《唐通事心得》作：這個鉢子是我的性命相關的了)，怎麼耐得？」豈不是好笑麼？

有關和尚因鉢破而動怒，無法超越嗔怒之敘述，實可見於《太平廣記》卷九十四〈華嚴和尚〉記載，其中情節相仿，其文云：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宮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眾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何？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已受持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於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²²

《太平廣記》之文字強調僧人對於鉢之執著，不僅因此而死，死後甚至必變為蛇，意欲復仇，後經華嚴和尚開示，方悟其執著無知，叩石而死。其文云：

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嶽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己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八九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怒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俯首閉目。和尚誡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向三寶。」令諸僧為之齊聲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出。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之位，為臨終之時，惜一鉢破，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舍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

²² [唐]皇甫氏：〈華嚴和尚〉，見於[宋]李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卷九十四，頁624。

而死矣。²³

其間具有因果輪迴與貪嗔無明等教訓，而《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則僅聚焦於和尚視鉢為生命的嘲笑，並將這段文字安排於朋友對話中，所謂「那晚有一個朋友到我家裏來講談，恰好我也閑空在家，因為留他作了半夜，講閒話」，文中先以反諷語氣描述和尚之節儉與侷促不安的窘態，其文云：

原來這個和尚是有一個寺裡住持，他這的寺裏香火興旺，有許多檀越時常送米送柴，只管供養，所以不消買米糧，寺裡雖有幾十個僧眾，都是溫飽有餘了，沒有托鉢，又沒有化緣，也過得去，這是菩薩的光明了。但是這個和尚大徹大悟的善知識，曉得過去未來的事情，看破了世情，看得世態水一樣，冰冷不過。往常不論出門不出門，都穿著舊衣，不肯穿著好衣裳。若是檀越們送一件衣服，送些銀子，再沒有蓄在手裡，銀子是把日用的東西使費扣下來，剩下的無論多少，都散送了周濟窮人家。衣服也是自己穿得不冷不寒，餘下的都送把人家穿。到方丈裏去看，沒有什麼家伙，不過一件道袍，夜裡鋪蓋的一件被褥而已。他規矩每一個月六遭出來托鉢，這是釋迦佛訂下的規矩了。

以揶揄嘲諷的語氣說明和尚看似自奉甚儉，「看破了世情，看得世態水一樣，冰冷不過」，「大徹大悟的善知識」，卻又視鉢盂為生命。再對照前文對老僧的描述，其文云：

那個老僧原是曉得相識這個朋友，要替他作揖，正奈那個袖子只有半截，左扯也蓋不來手，右扯也遮不著臂。只得抄著手，口裡說道：「今日為什麼寺裏去得暗了，莫非失曉了麼？貧僧今早出來托鉢，所以失迎了」。吩咐沙彌泡一壺好茶等居士隨喜。

無論是狼狽的拱手作揖或吩咐沙彌泡茶以待居士隨喜佈施，皆強調和尚之世俗，而後鋪陳和尚至其家說法，卻反因鉢被弄破而動怒，敘述者具有明顯的諧謔語氣與其評價意識，著重面向與敘述方向顯然與〈華嚴和尚〉強調心念與因果不同，然有關和尚之於鉢的故事梗概與對應態度則如出一轍。

²³ 同前註，頁 624-625。

(三) 剪裁段落、用以凸顯意識

《唐話長短拾話》另敘述秀才寫休書，以致有損陰鷲之故事，實即由《好逑傳》與《醒世姻緣傳》兩篇小說之段落組合而成，其文云：

當初有一個秀才，面貌生得標致不過，花容月貌，竟像個美人一般，若是把女女人家的衣裳打扮起來的時節，面生的人是不消說，連是一家裡的人也是認不出，混雜在女人家裡頭，不知誰男誰女，分別不出。算是天下第一個好人品的美男子。若是論他的人品，這樣秀美，性格就該溫存，不想人品雖然生得整齊，一性子就像生鐵一般，十分執拗，又有幾分膂力，有甚麼不如意，動不動就要使氣，動起粗來，等閒也不輕易見他說笑。倘或交接富貴的朋友，滿面上霜也刮得下來，一味冷淡。卻又作怪，若是遇著窮的朋友，滿臉堆下笑來，吃酒吃茶，歡歡喜喜，講到天亮也不知疲倦。更有一段好處，喜歡修善果，積下陰德，一味方便人家。人家若是緩急去求他的時節，不管甚麼人，一力周濟，若是諛言諂媚他，只當不曾聽見，不肯方便。所以人多感激他。這個秀才，平常夜裡出門到甚麼所在去，回家之時，規矩有兩個鬼，提著一對燈籠照耀，像個白日一般，一路上護他回去，就是小廝一樣的。及至到了門口，火也吹滅了，鬼也不見，好幾年如此。有一夜學堂裡做詩會，半夜回家不見其鬼，黑洞洞地墓闖進去，獨自一個回家來。到了自家門口敲門，那秀才老婆聽見有人敲門，曉得老公回來，連忙開門迎接，看他單身回來，就動了疑心，問說道：「今夜是如何鬼不送老公？」秀才說道：「正是我也老大不過意，往常哪一遭不送我，今脫一個也不送，不知甚麼緣故，一路上左思右想，再想不著。」那時節老婆把手托腮，沉吟了一回，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問他說道：「今日出門，莫非做甚事，難為人家麼？」秀才說道：「我自從幼年在筆墨堆裡生長的，只曉得讀兩部書，哪裡曉得歹事，也不曉得賭，也不曉得嫖，又不曾殺人放火，我心裡水清月白，並沒一點虧心。」老婆說道：「賤妾大常看見，君子做人忠厚，修路補橋，一心修陰鷲，因為感動天帝，天帝叫鬼做奴才，今晚鬼不來送，一定是破了陰德，天帝撤下你的了，今日莫不是做了甚麼損壞（壞）陰德的事情。」秀才見說這話，並不打話，理（埋）頭若（苦）想，想到雞叫時節，方纔想出來，點頭點腦（腦），連說幾句是了是了。老婆說道：「有甚麼情弊，何不早講，以過去的時（事）情，雖是沒做，道理挽回不來，曉得不是，以後好謹慎了。」

秀才說道：「我不是做甚不尷尬的事，今日到一個書畫店裡去，看今年秋闈的題名錄，回路上有一個人要替我說話，我說：「有甚話說」，他說：「這裡（裡）大街上，不是話說處」，要我酒店裡去吃兩杯酒再講。我推有事不去，他不由分說，挖了我便走，後來托我寫退婚書。這個人大恍惚，呢旦（況且）有力量一隻手緊緊揪住我，死不肯放，我再三推不托，沒奈何寫把他，只怕寫了這個休書，所以文昌帝撇下我的了。說罷，夫妻兩個嗟嘆不已，可感可感。

這段文字實為兩個不同小說段落之組合，其中描述秀才外貌秀美，個性正直不阿，眾人感激一段，實來自《好逑傳》第一回〈省鳳城俠憐鴛侶苦〉描述的鐵中玉，其文云：

話說前朝北直隸大名府，有一個秀才，姓鐵雙名中玉，表字挺生。甚生得豐姿俊秀，就像一個美人，因此裏中起個渾名，叫做鐵美人。若論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該溫存。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鐵一般，十分執拗。又有幾分膂力，有不如意，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貴朋友，滿面上霜也刮得下來，一味冷淡。卻又作怪，若是遇著貧交知己，煮酒論文，便終日歡然，不知厭倦。更有一段好處：人若緩急求他，便不論賢愚貴賤，慨然周濟；若是諛言諂媚，指望邀惠，他卻只當不曾聽見。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²⁴

有關秀才之俊秀、性格與行事風格之文字敘述雖略有出入，然主要內容實無二致。但《唐話長短拾話》則強調「更有一段好處，喜歡修善果，積下陰德，一味方便人家。」至於秀才夜歸時有鬼提燈護送、其後因無心之過為人寫休書，而有損陰德，不再蒙受天佑等敘述，則可見於《醒世姻緣傳》第九十八回〈周相公勸人為善，薛素姊假意乞憐〉，²⁵其文云：

周相公說的話也甚多，寫不了這些煩言碎語，大約與寄姐說的相同。又說：「這要斷離的呈稿，我是必然不肯做的。天下第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是與人寫休書，寫退婚文約，合那拆散人家的事情。

又有一事，也出在敝鄉一個寺裏：一位陸秀才，在隆恩寺讀書，從本寺土地門

²⁴ [清]名教中人編次：《好逑傳》，見殷國光、葉君遠編：《明清言情小說大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上冊，頁4。

²⁵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臺北：台灣文源書局，1979），頁1040-1042。

經過，凡遇昏夜行走，那個主僧長老看見土地廟內必有兩盞紗燈出來送他，非止一日。也就知他是個貴人，甚是將他敬重。後來見他在廟門經過，沒有紗燈迎送，以為偶然。一連幾次都是如此，主僧和他說道：「我一向敬重你，每見你晚夜時候從土地廟經過，都有兩盞紗燈迎送，所以知你是個貴人。這一連幾次不見了紗燈迎送，你必定行了虧心事體，傷了陰騭，被陰司裏削了官祿，以致神靈不禮。你可急急懺悔！」陸秀才再三追想，不得其故。

陸秀才想得：「再無別事可傷陰騭，必定為這件事，乾了神怒，削了我的官祿。」再三悔過，向那同窗極力挽回，說：「神靈計較，其事必係屈情。我係旁人，尚蒙天譴；你是本人，罪過更是難逃。」說得那同窗冷汗如流，好生惶懼，親到丈人家再三賠禮，接了媳婦回家，毀了休書。陸秀才也自到佛前懺罪。從此那個主僧，見陸秀才晚夜來往，土地依舊有紗燈迎送。陸秀才從此收斂做人，不敢絲毫壞了心術，凡事謹了又謹，慎了又慎，惟怕傷了天理。後來主僧見他兩盞紗燈之外，又添了兩盞。後來陸秀才做到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封妻蔭子，極其顯榮。

《唐話長短拾話》將提燈護送者之身分由《醒世姻緣傳》之土地公變為鬼，將提醒者由佛寺長老改為秀才之妻，且提醒內容皆為「傷了陰騭」「破了陰德」之觀點，並增加秀才夫妻之反省對話，最後以秀才百般苦思後終於醒悟，實因為人寫修書以致未再獲得護佑作結。

《唐話長短拾話》僅敘述秀才因未能堅持己見隨意為陌生人寫休書，以致神靈不再護佑而懊惱不已，所謂「寫了這個休書，所以文昌帝撇下我的了」，不似《醒世姻緣傳》中陸秀才為同窗執筆，並大幅刪落陸秀才卻未能明察實情，誤信同窗之正室必有姦情，因而大損陰騭，²⁶「神靈不禮」，以及陸秀才後來潛心悔改謹慎修持、最終再獲榮顯的情節。《唐

²⁶ 《醒世姻緣傳》敘述陸秀才反省內容，所謂「只有一月前，也是個同窗，家中一妻一妾，其妻是個老實的人，其妾是個娼婦，買囑了合家大小，弄成了圈套，說那妻有甚麼姦情。那同窗不察虛實，意思要休了他。但那娘家是個大族，又事體雖弄得大有形跡，沒有顯證，決殺不得。知陸秀才是有主意的人，又是同窗中的至契之友，特地與他商量。人家的家務事情，就是本家的正經家主，經了自己的耳朵眼睛，還怕聽的不真，內中還有別故，看得不切，裏邊或有別因；你是個異姓之人，不知他家深淺長短，扯淡報那不平。本人倒說只是不曾有甚顯跡，他卻說道：『合家大小，眾口一詞，都說是真，這也就是國人皆曰可殺了。你還要等甚麼顯證！若等得顯證出來，你綠頭巾已經戴破，又好換新的了！』」那同窗道：『只嫌他是大家，怕他有人出來說話，只是沒有實據，對他不住。』陸秀才道：『好好的高牆，沒有瓦片，去了棘茨，牆頭都爬成了熟道，還待甚麼才是實據？他家沒人說話便罷，若是有人說話，要我們同窗做甚？我為頭領，邀眾人出來鳴鼓而攻。這當忘八的事，豈是容情的？抵死也要與他一著！』說得個同窗的主意，定了八九分的規模，到家再被那娼婦激了幾句，湊足了十分主意，創了一個休書的稿，與陸秀才看。陸秀才還嫌他做的不甚扎實，與他改得鐵案一般，竟把個媳婦休將回去。」「娘家的人當不起休書裏面寫得義正詞嚴，連自己的娘家，把這『莫須有』的事，也都信以

話長短拾話》將兩則不同出處的小說文字加以組合，強調的無非為人應敬謹慎行、正直不阿、勤修陰鷲，不能絲毫怠慢鬆懈的價值觀點，也因加入《好逑傳》描繪鐵中玉的文字，使鬼魂之所以提燈護送的原因更加具體，更具說服力。

唐通事教材之改編小說，顯然具有當時長崎做為商港與唐通事職務之時空認知，如此的拼接置換顯然是敘述者刻意安排，具有通事教材的自覺。相關的改寫或鋪陳的現象呈現了唐通事教材對中國小說或善書故事片段之吸收與理解，既有倫理關懷，亦見嘲諷揶揄，形成通事教材之特殊面貌與內涵。

三、異國視野的融合論述

唐通事教材此類寫作現象固然有古典小說商品化與傳播之背景，然而對於價值主張之承襲與論述，則或與特定唐通事具有中國淵源有關，如《唐話長短拾話》所云：

長崎這幾十萬戶人家，一半是唐種，先祖都唐山人，所以不但是這一件做事，還四時八節的人情禮貌都學唐山的規矩。

以為當時長崎人口有一半是具有中國血緣的「唐種」，是以唐山的四時八節人情禮儀等規矩都需理解習得。唐通事具有某種程度之中國淵源，但身處日本，負責中日通商事務，固然「四時八節的人情禮貌都學唐山的規矩」，但畢竟是某種現異國異文化的認知，唐通事即使有中國血統，但面對唐山人，仍以異國或異文化的角度對待，唐山的語言與人情文化之於唐通事，仍是需要相當學習與理解之對象，而唐通事養成的教養內涵亦有待此而完成。

唐通事於特殊血緣與文化背景之下編寫唐通事教材，於此雙重且融合背景下，對於古典小說及善書之融通運用，也形成特殊之書寫特徵。此類唐通事於編寫教材之際，於古典小說之接受與運用上並非全然複製模擬，而是於中國的文史故實與通俗文學等基調上加以融通，做為唐通事學養教育所用，其訴諸對象顯然是唐人與其文化背景之理解，展現其接受異國文學的自覺與特殊性。此類書寫現象無論是題材或形式之模仿改寫置換等皆具有明顯的中國古典小說與善書等通俗文本的意識，但與一定時間重疊的日本讀本小說或翻案小說卻有所差異。²⁷

為真。可怪那個媳婦拙口鈍腮，只會短了個嘴怪哭，不會據了理合人折辯，越發說他是賊人膽虛了。」更加凸顯陸秀才行事不妥有損陰德之處。（頁 1041-1042）

²⁷ 李進益：〈日本漢文學概況〉以為，江戶中期以後因中國通俗小說的大量傳入與普遍流行，日本因此有模仿創作的現象，而以上田秋成（1734-1809）與都賀庭鐘（1718-1794）為代表，見李進益：《明清

同樣是對於中國古典小說與善書之承襲新創，日本讀本小說與翻案小說有意將時空人事日本化，但對於中國小說強調的勸懲目的亦有所吸收，而非單純提供娛樂。²⁸亦有抽繹情節人物情景重新加以結構組織者，使新作品成為既與原作有一定關聯卻又有所區別。²⁹尤其後期讀本小說的特徵趨勢，形成雅俗共賞與和漢混合的文體形式，提供另一種寫作模式。³⁰如此的有意塑造於日本翻案文學乃至讀本小說的發展史中，皆呈現了日人作家的對改寫的自覺與不同詮釋。至於唐通事教材，則更加強調特定讀者身分與教育取向，主要為口語的訓練與學習，而非閱讀，價值觀點的展現也趨於通俗功利，具有實務考量，相關的運用小說素材片段或形式之書寫表現亦展現其特殊性。

（一）口語敘事的模擬

《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模擬白話小說與戲曲熱衷說明勸世之表現特徵，藉由多方譬喻與民間俗諺呈現人生價值或常民知識，如《鬧裡鬧》開頭即引用，「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狗窮思跳，人窮思巧」，文中亦有「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前述《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所謂「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等，唐通事教材亦加以吸收模擬，藉此諺語展開陳述，藉以展現特定價值判斷，並做為說明相關小說內容之敘述框架，以進行通事之教養。

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第一章第二節，頁 19-20。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 379-381，及李時人、楊彬：〈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復旦學報社科版》2006 年 3 期（2006），頁 125，以為初期讀本小說於寶曆至文化年間（約 1751-1804）於京阪出現，以都賀庭鐘（1718-1794）與上田秋成（1734-1809）為代表，後期以文化至文政（1804-1830）年間，以江戸山東京傳（1761-1816）及曲亭馬琴（1767-1848）為代表。

²⁸ 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視》，同前註，頁 387，以為日本後期讀本小說因模擬中國白話小說，於語言上創造和漢混合體與雅俗折衷體，使文字通俗，雅俗共賞。並以為日本的讀本小說也吸收到中國小說具有的勸懲意識，使讀本小說也強調實用的教化功能，而非單純提供娛樂，而後期讀本小說除了開始長篇創作之外，由於多模仿《水滸》、《三國》等歷史演義而創作，是以可視為歷史小說，因為吸收中國白話小說的書寫方式，故此類讀本小說已逐漸脫離日本歌舞伎、淨琉璃等演劇的影響，形成一種具有中國演義小說風格的作品。

²⁹ 李時人、楊彬：〈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同註 27，頁 126-128。所謂翻案，指的是將外國或本國的作品，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造，或將素材進行再創造，改造或再創造的程度不一，有的僅是將人物時空風俗習慣置換，有的則是抽繹情節人物情景重新加以結構組織，使新作品成為既與原作有一定關聯卻又有所區別。

³⁰ 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視》，同註 27，頁 205-206。

這類據事直書、彰顯說話人聲口的形式如《鬧裡鬧》即被視為是話本小說形式。³¹其中「話說」「閒話少說」「說話的，為何只管講賊人的話？因為要講長崎的野人們放火的這一段話」等模式實為明顯特徵，且熱衷說明原委或鋪陳形容，《鬧裡鬧》中詳細列舉盜賊之別，以為強盜有海賊、強盜、響馬、剪徑、剪絡等，其文云：

這個強盜有幾等幾樣的名色，如今把我所記的數落一灘，說把你知道。譬如在海上做賊的，叫做海賊，在山上打劫了過往客人的行李包裹的，叫做剪徑。一個人憑熱鬧的所在擠來擠去擠在人叢裡頭，故意挨肩擦背，擠緊了，神不知鬼不覺，把剪刀剪斷了人家的荷包偷了去，這個叫做剪絡。唐山有一種響馬強盜，一夥老賊種，好不利（厲）害。生得力氣高大，武藝也熟（熱）鬧。人家聽得響馬的這一聲，魂不附體，心裡突突地跳起來，通身亂抖，怕也怕得狠。……也有梁山泊那一夥的一樣，合了許多夥計，在山上下了寨，劫掠官府的東西，這一夥人還曉得義氣，並沒有搶奪百姓人家的東西。聽見某官府貪了銀子錢糧，凌虐百姓的，就去斯（廝）打，打破了衙門，擄掠了錢糧，說道：替天行道，替百姓除了大害。若是做官清正的好官府，再不敢去驚動他，人家的草寇，就是這個了。

這類博物之書寫特質，具有明顯的教育取向，無論是行文語氣或論述內容，亦類似中國日用類書與童蒙書，³²其中的事理之分析說明，所列舉之各種事物名色，各具意義，也類似日用類書或童蒙書與話本小說之敘述語氣。³³

³¹ 林彬暉：〈日本江戶時代唐話讀本教材與話本小說〉《域外漢語教科書編選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作品研究（14世紀至20世紀初）》（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四章，頁84-87及96，以為《鬧裡鬧》具有入話、正文的話本形式特徵，自覺的模擬話本小說說書人的語氣，進行教化。

³² 另一寫本唐通事教材《小孩兒》，收於〔日〕六角恆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第一集第一卷，擲揄和尚因鉢被打破而大怒一則，亦大量列舉和尚日常飲食素菜並無太牢滋味，並列舉「豆腐麵筋，鬼豆腐、白蘿蔔、黃蘿蔔、芥菜、青菜、白菜，諸葛菜、蔥菜、韭菜、蒜頭、松菇、香菇、木耳、竹筍、香瓜、甜瓜、黃瓜、菜瓜、苦瓜、絲瓜、西瓜、南瓜、羊眼豆、刀豆、蠶豆、長竿豆、白篇（按：應作扁）豆、茄子、芋艿、山茹、茨菰、荸薺、蓮根、豆芽、菜豆、腐皮」等，實有博物語言教育之跡。另外，中國傳統啟蒙書有《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等，這些宋元以降普遍流傳且傳入日本的訓蒙之書或三言或四言，均以韻文出之，以利記誦，內容不外是宇宙自然、為學為政、百家姓氏、日用祭祀、農耕戰事、飲食園藝、歷史典故與道德觀念、人生哲理等，無論是句型或內容，皆與通事教材之形式有所相關。

³³ 又如〔清〕酌元亭主人編：《照世盃》，收於張道勤、徐中偉、袁世碩、黃強校點：《西湖佳話、豆棚閒話、照世盃》，《中國話本小說大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四〈掘新坑慳鬼成財主〉之入話云：「只是氣也有秉得不同，用氣也有如法不如法。若秉了壯氣、秀氣、才氣、和氣、直氣、道學氣、意氣、清氣、便是天地間正氣；若秉了暴氣、殺氣、癡狂氣、淫氣、慳吝氣、濁氣、俗氣、小家氣，便是天地間偏氣。用得如法，正氣就是善氣；用得不如法，偏氣就是惡氣」，亦是不厭其煩大量列舉的敘事模式。

又如《唐通事心得》與《唐話長短拾話》皆以俗諺提及人情世態的認知：

「有錢千里通（《唐通事心得》作：有錢可以通神），無錢隔壁聾」，這兩句話是正真說體貼了。手裏有錢（《唐通事心得》作：手裏有了銅錢），不論大事小事都做得像意，自由自在，沒有什麼干（《唐通事心得》作：罣）礙。死的也活得來，活得也死得來。你把銀子放光的時節，憑你有權有威的大官府（《唐通事心得》作：有權有威的大官員），也是自家奴才一般，使得鬼走（《唐通事心得》作：使他走，銀子的神通是廣大得緊。所以說道有錢使得鬼走）。你要叫一個鬼雜差雜使，略略送些雪白（《唐通事心得》作：黃白）的東西，就來效勞。

其中「有錢千里通，無錢隔壁聾」，亦見於洪州百丈惟政禪師語錄，顯然是對於世態炎涼之認知與評價。³⁴《唐通事心得》亦云：

所以我說做一個人，不要貧窮。一窮窮起來，就是親切的也生疎起來了，血脈相連的親眷也做冤家，就是曉得些義氣，心裏也雖然厭惡起來，但是沒甚原故，不好意思拒絕人，外貌假恭敬，來往幾年，後來一步步生疎起來，弄得後其間，他也不來，我也不去，大家都看破了。沒有一個親眷來往，只當土掘坑裡頭鑽出來的一般。舉目無親，好不冷靜。

以所謂「血脈相連的親眷也做冤家」「土掘坑裡頭鑽出來的一般」「舉目無親」以對比與譬喻評價人情冷暖，提醒眾人困頓之際的可能遭遇。

俗諺的引用顯現唐通事教材對於中國通俗價值觀點的理解，除了人心勢利、世情冷暖的評價外，有關命定思考，亦是庶民的普遍觀點，如《唐話長短拾話》云：

「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這兩句是自從當初傳下來的常言。大凡人家一死一活，都是命裡注定，再不能勾（夠）勉強作得來。譬如你害了一個病，死期還不到的時節，請個土郎中，胡亂吃兩帖藥，就是輕輕巧巧全愈（痊癒）了。

³⁴ [宋]普濟編：《五燈會元》卷十二，網路藏經閣，網址：http://www.suttaworld.org/ancient_t/wdhy/5-12.htm，[宋]雷庵正受編：《嘉泰普燈錄》卷三，「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曰：『有錢千里通』，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華？』曰：『無錢隔壁聾』」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網站，<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8380&page=25>

倘若陽壽該死的時節，憑你請個醫道精通，配藥熟閑（嫻）的好醫生，也不濟事。

展現凡事皆天命，半點不由人的認知，而由此想法所衍伸的，則是為人處事當應守分，避免逞強。《唐通事心得》也有類似的看法，其文云：

大凡人家一飲一酌，都是前定，沒有可以勉強求得來的道理。所以「前定」兩個字，冷淡了許多覬覦的念頭，消磨了多少暴（爆）燥的手腳。不曉得前定的人一下有了要求的念頭，後來指望到手，一下到了手，後來只管要求，不管因（應）該做得，因（應）該做不得，妄求非福，被貪心絆住了，想不到道理上，做出不公不法的勾當，直到後頭收煞不住的時節，方纔懊悔，這也遲了。譬如做生意的人，拿了自家本錢，也要等他運氣亨通，機緣湊巧，不論在家裡走水，整千論萬來撰（賺）銀子，若是時運不濟，緣法不湊，要撰（賺）三厘半文，費了偌大的精神，還不能勾，莫說三厘半文，連那自家的本錢還有折的精空了。

藉由前定、時運、緣法與機緣等概念，說明妄求非福的無知，並以做生意為比喻，若未認清命定的道理，輕舉妄動，「被貪心絆住了」，終究一場空。至於貪心之形容，《唐通事心得》也以「唐王去求仙，彭祖祝壽長。嫦娥嫌貌醜，石崇謙無田」來說明貪心不足，這類文字熱衷說明與分析，一如白話小說之說話人語氣，與其他唐通事教材甚至有相似的內容，所傳輸的價值觀點也相同。³⁵

除了安分行事的主張外，《唐話長短拾話》另提出天理昭彰的看法，其文云：

原來人家做好人，眼前雖然失了些便宜，到後來天可憐見，討個大便宜；做不好人，眼下縱或討些便宜，後來天理昭彰，到（倒）失了便宜。譬如做了醜事，東遮西護，怎麼樣要掩飾，也掩飾不來。這是天理昭彰的所在，因為常言說得

³⁵ 引文最末「譬如做生意的人，拿了自家本錢，也要等他運氣亨通，機緣湊巧，不論在家裡走水，整千論萬來撰（賺）銀子，若是時運不濟，緣法不湊，要撰（賺）三厘半文，費了偌大的精神，還不能勾，莫說三厘半文，連那自家的本錢還有折的精空了。」亦見於《瓊浦佳話》（寫本，日本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年代未明）卷四唐通事勸告唐人接受其所提的貨物價格，其中文字為，「若是運氣亨通，機緣湊巧，不管在家走水，整千論萬的來賺銀子。若是時運不通，緣法不湊，要賺三厘半文，費了偌大的精神還不能勾了。英（莫）說三厘半文，連那自家本錢還有折的精空。所以到明年，或者運到時來，不費一些氣力，把兩年所折的本錢盡皆討得回來也沒憑據。」可見通事教材抄寫之跡，以及價值之傳輸。

好：「有麝自然香，不必當風立」。

主張吃虧即佔便宜，因天理昭彰，善惡言行自然為人所知，無須刻意標榜或刻意掩飾。類似的價值觀點亦同時見於《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其文云：

原來做了不公不法的事情，雖是眼下逃得性命，究竟逃不過，憑你怎麼半夜三更，黑暗暗地鐵桶一樣做准（準）備，也是上天不肯饒恕。因為常言說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又說道：「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

所謂「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又如《鬧裡鬧》所謂「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終生忤逆兒」，實出自啟蒙書《增廣賢文》，這類庶民的價值判斷與人生意見既見於日用類書或善書，也多見於白話小說。積極引用俗諺、不厭其煩的說明分析，藉以表達世俗真理的現象，實為小說或善書普遍運用的敘事方式，亦是唐通事教材對古典小說的另一種承襲。

（二）庶民道德的融通

白話小說、善書與日用類書的傳入日本，使庶民的道德價值被思考，彼此又有相互借用發揮的現象，並成為教化工具。由於善書具有明顯的善惡報應色彩，通俗易懂、簡單易行，故傳播極廣，影響深遠，尤其至明代中葉以後，文人亦參與善書之刊行或註解。³⁶而書坊則熱衷刊刻的民間日用類書，雖有市場導向考量，但也成為大眾生活日用與初級教育之來源。³⁷明清時期善書和通俗小說發展鼎盛，彼此在書寫形式與價值內涵上多所融通，互有影響。如通俗小說採用善書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以及影響創作意識，而善書作者為求生動有趣，以產生更大的勸善效果，也借助了小說的藝術形式及寫作手法，二者相互滲透，界線因此模糊。³⁸

³⁶ 萬晴川：〈明清小說與善書〉，同註7，頁30，明清是善書的盛行期，不斷再版以前的善書，如《太上感應篇》就出現了眾多版本，李贄、高攀龍、陶望齡、袁黃、惠棟、俞樾等著名文人都曾為《太上感應篇》寫序或作注。其次則是善書之新作不斷推出。如佛教寶卷、功過格等勸善書廣為流行。所謂功過格，是將自己的言行予以善惡功過的分類，並為善惡評估打分，依此分數作為判定行為倫理價值的標準，並作為獲取禍福報應的根據。其中袁黃的《了凡四訓》對明清社會產生了相當影響。

³⁷ 劉天振：〈總論〉，《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91-92，及吳蕙芳：第二節〈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的盛行〉，《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上冊，頁35-36。

³⁸ 如劉天振：〈總論〉《明代通俗類書研究》，同前註，頁28-31，以為，韻語知識讀物有兩大類：一為訓

《鬧裡鬧》、《唐通事心得》與《唐話長短拾話》剪裁改寫小說之同時，也藉以傳輸善書的倫理關懷與敘事模式，如《鬧裡鬧》敘述長崎發生大火災時，守節孝婦救病姑之故事，「這三個兒女縱或燒死也罷了，若燒死了老姑，到了泉臺之下，有何面目相見丈夫。」³⁹「走了一兩條街，爭奈撇不下那兒女，做父母的愛惜兒女，這是天理良心，因（應作應）該如此」³⁹「當下把老娘坐在人家房簷下，自己唯獨一個急急忙忙走回來」³⁹「子母相見，好不歡喜，忙把三個兒女，一個負在背上，一個挾著在腋下，一個攜手同走」，此段文字或亦來自相關筆記小說，尤其增加的不願改嫁、孝養病姑、或王家贈金等情節鋪陳，則有如中國歷來相關文本對於孝婦守節養姑，或孝婦奉姑感火，破屋得以「四面頽垣，齊如界畫」等敘述模式與理念，而此類思維卻又建立在長崎之歷史時空，可見沿襲現象中之明顯異同互通，而非全然模擬。³⁹

又如《唐話長短拾話》記載秀才為人寫休書有損陰德等，皆呈現唐通事教材對於為人

誠類，如兒童守則、格言諺語等；二為介紹掌故與各科知識，如《女論語》、《蒙求》等。通俗類書採用詩歌形式敘事，與通俗文學的敘事傳統有密切關係。民間類書與話本小說、戲曲之體制面貌、文化品格完全相通。又如〔日〕小川陽一：〈明代小說與善書〉，《漢學研究》6卷1期（1988），頁331-340，以為自南宋初期出現《太上感應篇》以來，明清兩代有了大量善書，且普遍流行。尤其以《太上感應真經》、《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文昌帝君陰騭文》等三種善書被稱為《三省篇》或《三聖經》，而特別受到尊重。這些善書盛行期正好也是中國小說的全盛期，二者應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響。而主要的影響有三層面，分別是小說中的故事人物看善書、勸人看善書或出版善書等情節，如《西湖二集》卷三十〈馬神仙騎龍昇天〉；小說引用善書語句，如《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與《石點頭》第七卷；小說中的某一部分或整體內容以善書思想做為題材或結構，如《西遊記》《紅樓夢》之命運觀以及《剪燈新話》的〈三山福地志〉等。萬晴川：〈明清小說與善書〉，頁30-36則以為，明清是善書和通俗小說發展的鼎盛時期，善書與通俗小說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的關係。善書對通俗小說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和創作理論進行滲透；另一方面，善書的製作者為求通俗易懂，生動有趣，以產生更大的勸善效果，故又借助了通俗小說的藝術形式和寫作手法。

³⁹ 《鬧裡鬧》，收於〔日〕六角恆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第一集第一卷，敘述長崎大火時，當地守節婦強忍兒女啼哭待救的煎熬，先背負中風病姑逃難，以為「這段敘述於強調大火、病姑與孀婦等關鍵字，則與〔清〕紀昀：《瀋陽消暑錄》，《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二，頁31之記載有所類似，「乾隆庚子，京師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頽垣，齊如界畫，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然《鬧裡鬧》寫作年代未明，由其改寫《蝴蝶媒》情節以觀，則寫成年代當於乾隆十九（1754）年後，而《瀋陽消暑錄》刊於乾隆五十六年（1792）後，二者差距時間達四十年，且僅簡單敘述故事梗概，未見進一步鋪敘，由於情節之互有參差，加之前後時代未能確認，尚無法確認果出自《瀋陽消暑錄》。未敢直接斷定二者之間有明確傳輸與接受之跡。至於《鬧裡鬧》所增加的不願改嫁、孝養病姑、或王家贈金等情節鋪陳，則有如中國歷來相關文本對於孝婦守節養姑，或孝婦奉姑感火等記載，如〔漢〕劉向《列女傳》卷四十五與〔明〕呂坤《閩範》三〈孝婦一〉皆記載漢陳孝婦遵夫囑孝養老姑，不願改嫁之事。以及〔明〕宋濂《元史》卷二百列傳第八十七〈列女一〉記載，「趙孝婦守寡，事姑至孝，得甘旨必持歸奉姑，甚至鬻次子為姑買棺，於火災中棺重不可移，撫膺大哭，而風轉而北，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如〔清〕吳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成書於乾隆十四年（1749），初刻於嘉慶八年（1803）其中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亦敘述正撰寫「鄉約書」的王玉輝稱讚鄧質夫母親，「當初令堂老夫人守節，鄰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天下皆聞」，見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592，可見此類勸善故事敘述模式與價值內涵在善書及小說創作間之傳述沿襲。

處事當應敬謹慎行不損陰鷲之看法。事實上，《鬧裡鬧》取材的《醒世姻緣傳》之識語即云，「無非勸人為善，禁人為惡」「余願世人從此開悟，遂使惡念不生，眾善奉行，此之為書，有裨風化，將何窮乎？」⁴⁰即呈現與善書《陰鷲文》所謂「眾惡莫作，眾善奉行」、「忠主孝親，敬兄信友」等信念之融通。⁴¹

唐通事之傳播、翻譯善書，以及小說與善書相互影響之結果，也使唐通事教材於語言學習過程中同時接受其間所蘊含的道德價值，具有相同的倫理關懷。如《唐話長短拾話》指出：

我說一個譬喻的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大凡果報是免不得，你若方便人家，人家也來方便你，你吃虧了人家，人家也來吃虧了你。做了陰德，必有陽報。這個自然之理了。

呈現了來自善書與小說影響之跡。具體的修身作為包括守分安貧，勤儉自持，如《鬧裡鬧》即提出一旦敗家將有辱家門之虞，其文云：

寧可做酸澀的人，不要做敗子。

……

明日破了家私，到了沒設法的時節做強盜，自己一個人壞了體面還罷了，連祖上的名稱也惹得不好聽，都說某人是某家的兒子，某人是甚麼人的孫子，父母不教訓，所以不學長俊，做個憊懶之人，弄到這個地步，到說父母不好，可見家教要緊。

⁴⁰ 殷國光、葉君遠主編：《明清言情小說大觀》，同註13，頁452所引之識語。

⁴¹ 陳芷輝：〈明清社會勸善書及功過格的歷史作用及價值——以《太上感應篇》《太微仙君功過格》《文昌帝君陰鷲文》為例〉，《廣西社會科學》5期（2008），頁54-55，《文昌帝君陰鷲文》簡稱《陰鷲文》，約成於《太上感應篇》之後，至遲不會晚於元代。「陰鷲」源於《尚書洪範》：「惟天陰鷲下民」，意謂上天暗中保佑人們。在《陰鷲文》中，「陰鷲」是指要求人們多積陰德陰功，文昌帝君將會保佑並賜予福祿壽，使子孫後代繁榮發達。強調的內涵有家國同構的倫常關係，以忠孝為基本原點，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思路。其中「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報答四恩」，「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等，都和中國傳統道德重視家族倫常關係的特點一致。注重以三綱五常的原則處理家族中父子長幼等級關係，並推廣以處理君臣尊卑等級關係。如做為官吏，應報答天地君親師的恩典，在家為孝，入朝盡忠等，皆是不能違背的根本道德信條。若能以此為人生準則，則福祿壽將降臨，科場得意，富貴榮華，兒孫滿堂，世代家道不衰。

以為與其奢華，不如習於酸澀，則破家之際尚可忍受貧窮，靜待時運交泰的時機，可免一時沒辦法淪落成強盜，令祖上與父母蒙羞，切勿為敗子，否則將有辱家門，一如傳統家訓之教養原則與價值觀點。

此種百姓日用之學可視為是傳統倫理的生活化、通俗化，書寫形式淺白易懂，多以通俗的儒家觀點融合道家、佛教觀念，做為大眾的道德意識和行為準則。唐通事教材吸收承襲如《太上感應篇》、《陰騭文》或《勸善錄》等通俗善書，並融合各階層之勸善思想與道德理念，成為修身之倫理規範。這些為人處世之基本規範，可視為某種程度的世俗化倫理關懷。這些日用類書的觀點藉由小說敘事形式之改編與模擬，於唐通事教材也得以展現，形成庶民的人生評價，如《鬧裡鬧》記述潮州人於蘇州虎丘遭遇騙子，以及《唐通事心得》與《唐話長短拾話》揶揄僧人執著於鉢之無知貪嗔，這些小說常見的嘲諷世情之言語亦多見於唐通事教材。⁴²

（三）通事學養的訓練

唐通事教材之教育取向顯然以唐話之訓練為中心，於白話基礎上，相關價值認知、理解與詮釋由此展開，且意識到通事職責與面對之唐人背景，相關學養訓練與文言漢學系統自有所不同，其中的倫理價值往往透過通俗文本之詮釋加以傳遞與接受，傳統價值固然，所謂世情冷暖尤其需有體認，方能進行良好的通商溝通。是以唐通事教材有意地吸收小說之白話書寫形式，也承襲小說與善書相互融通之勸善、勸孝、勸學等倫理思想。不僅要能以流利唐話溝通應答，也須熟習依循唐山的人情事理，實為對唐通事素養之期待，如《唐話長短拾話》所云：

有一點墨汁，不曉得忠孝節義的解說，替飛禽走獸，有何差別？面貌雖是人家，那心腸是鳥獸一樣的了。

⁴² 如《小孩兒》，收於六角恆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第一集第一卷，有類似敘述，詼諧揶揄的態度亦同，其文云：「你看和尚也要辛苦，撞鐘撞鼓，念經坐香，口裡吃的東西也沒有太牢的滋味，寡是素菜，……這樣東西，或炒或燒，收拾起來吃，比魚肉的味道還差得遠，這個也是佛家的禁戒，不得不依他。他那一天講經講到三界火宅，火是嗔恚之火，戒示大家不可發惱。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要是忍著惱，不要使性。有一個光棍的不慌不忙走過來，把和尚的鐵鉢隨力氣丟在石板上打破了，打得粉碎。這和尚住了講經，發話大惱，說得那光棍笑嘻嘻對和尚說道：『師父剛纔勸我們不要發惱，說得坐不還冷，倒是自己會惱起來。』說得和尚無言可答，默默而退。可笑可笑。」

於通事學養訓練中，強調忠孝為本、勤學慎行，子弟務須忠孝，因忠孝為德之本，人之道。⁴³不僅強調須務本求學，充實學識涵養，更要求人倫教養，以求道德完備。

於此，唐通事教材既模擬白話小說之敘述方式，⁴⁴又取材小說融通善書之內容，分別提供了唐通事於口語與修為上之訓練依據，包含語言、價值文化乃至庶民信仰、日用技藝等訓練方向。⁴⁵如《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即以為，「做一個唐通事不事（應作是）輕易做得來，一則講話，二則學問（《唐通事心得》作：學文）」，如《唐話長短拾話》對於黃梅雨的形容，其文云：

原來今年多雨，正月起到本月，沒多幾時天晴。晴了五六天，就要落雨。及至這兩日梅子將黃了，所以更加多雨，常言說：「天要落雨，娘要嫁人」，譬如天既然要下雨，憑你千方百計，怎麼樣要阻擋也阻擋不來。

又云：

正是這兩日出笋的時節，原來吃東西，不論葷菜素菜，簇新的自然好吃，這個不必多講。還有一種道理，常言說道：「寒不擇衣，飢不擇食」，這裡到鄉下，說莫說，半天的路，辛辛苦苦走了危險的山路上，正在肚裏飢餓的時節，吃笋所以覺得十二分好吃。

多方說明、引用諺語用，既適用於通事口語學習，陳述的常民知識，也可提供通事有關人情智慧之增長，符合所謂「講話」與「學問」的要求，於世情常理與庶民生活之理解。又如《唐話長短拾話》開頭即引用諺語，說明時刻用心學唐話的重要，其文云：

⁴³ 如唐通事教材《養兒子》，收於〔日〕六角恆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第一集第一卷即引用《陰騭文》，以說明忠孝乃為人之本，所謂「《陰騭文》說道，『諸惡莫作，眾善宜行』。惡於人者，天不容他，這個不必多講。眾善者不可細言，多得狠（按：應作很）。做了陰德，必有陽報，其中最要緊的是忠、孝兩樣。忠於主公，孝於父母，這兩樣是德之本，人之道也。」

⁴⁴ 林彬暉：《域外漢語教科書編選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作品研究（14世紀至20世紀初）》，同註31，頁96。由於江戶時期話本小說傳入日本之數量相對較大，使唐通事於編寫教材之際，無論是形式結構或語言風格，皆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話本小說的影響。

⁴⁵ 中國傳統啟蒙書有《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等，這些宋元以降普遍流傳且傳入日本的訓蒙之書，或三言或四言，均以韻文出之，以利記誦，內容不外是宇宙自然、為學為政、百家姓氏、日用祭祀、農耕戰事、飲食園藝、歷史典故與道德觀念、人生哲理等，無論是句型或內容，皆與通事教材之形式有所相關。有關《千字文》、《三字經》與《百家姓》之成書、道德教育取向與傳播流行，可見吳蕙芳：〈識字與雜用〉，《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學生書局，2007）第三章，頁132-133，及梁其姿：〈《三字經》裡歷史時間的問題〉，收入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頁34-36。

「閒時不燒香，事急抱佛腳」這一句常言是要人家往常用功夫的意思。你若日常間沒有信心燒香，忽然遇著患難緊急的事情，手忙腳亂，連忙去抱住了菩薩的腳頭，要救急，菩薩那里（哪裡）肯救急？譬如你們打常不肯用心學話，一下見了唐人，要講兩句話，憑你咬牙切齒的，怎麼樣要講，也講不來，大家當心當心。

顯現了唐通事教材利用說話人教誨語氣之形式，徵引用俗諺以傳輸用心求學「往常用功夫」的價值觀點。

除了說話人語氣的模仿，相關的倫理素養亦為唐通事教育所注重，唐通事教材強化了話本小說的議論模式，其中既有明清話本小說的敘事觀點改變趨勢之因素，而勸說議論形式與價值期待也呈現善書所具有的勸善警醒特徵，成為唐通事學識人格養成之準則。

一如《鬧裡鬧》於敘述孝婦於火災中先救病姑一事結尾所說，「既要學話，也要學道理」，其文云：

可見孝是感動天地，又感動人家，今日在下做這一本俗語，因為要說孝婦這一段話，又先說火燒的話，做個入港，但凡這裡來學話，但留心學得這一本俗語，還要把這孝婦做個樣子，孝順父母，一則話也講會了，一則天地保佑，自然出頭。

顯然將學習唐話與道德教育合而為一，除了須習得流利唐話，也應注重修為學養，即如前述《唐話長短拾話》所謂，既要有「墨汁」，也要「曉得忠孝節義的解說」，將學習與道德合而為一，不僅強調須務本求學，尤須注重人倫品性，成為通事學養的基本要求。

於此基礎上，通事教材對於唐通事之學習態度與發展，亦展現相當期待，《唐話長短拾話》與《唐通事心得》皆有相關的主張，其文云：

據我看來，目下長崎的後生家，擔了個通事的虛名，不去務本，只看得玩耍要緊。唐山說話竟不會講，穿領長衣，插把長刀，只說是東也去耍子，西也去耍子，遊遊蕩蕩，買酒買肉，只管花費銀子，撒潑得緊，這個大不是了。說莫說，講話是通事家的本等了，王家大俸大祿教你做職事，難道特特送你花哄上用掉了不成？要是教你養老子，養妻養子的了。你若話也講得透徹明白，書也讀得稀爛，肚裏大通，那時節，不消自己做門路，人人引薦你，自然有個大前程。倘或說話糊塗，要長也講不來，要短也說不來，這樣沒本事，哪個肯抬舉你？

一生一世出頭不得。

規勸通事家的子弟於承襲通事職務之際，當應刻苦務本，既求講唐話流利，也要嫻熟學問，並約束自身，認真學習，有本事之際，自然可獲得引薦而有前途。而學習態度尤應腳踏實地、切忌浮泛不實，二書皆有相關論述，如《唐話長短拾話》云：

（講話）（學問）這兩件是通事家的家常茶飯，不足為奇。單單會講兩句話，會拈筆頭，也做不得那算盤上歸乘除的算法，生意上塌貨營運的道理，世情上的冷暖高低，這等的事情，都要明白。更兼有膽量，纔是做得大通事。若是小氣鼠膽的小丈夫，夢裡也不要想做大通事。

除了口語流利、學問累積之講究外，所謂「買賣的道理，世情的冷暖高低」等擴及生活經驗或人情世故之學養，都是對唐通事學習訓練之期待。而這類教養內容實不出小說或善書所傳輸的價值，又如《唐話長短拾話》所云：

原來天下的事情再沒有（《唐通事心得》作：再沒有一個）學不成，常言說得好：「天下無難事，都來心不專」，你（《唐通事心得》作：爾）若死心踏地用工夫的時節，自然學到了。倘若浮浮泛泛不認真，悉聽你掐虱子一般小過（《唐通事心得》作：小可）的事情也學不來，不但是唐話，不拘什麼事體都是一樣的。

強調唐通事之學習唐話與學養，皆應切實努力、專心學習，甚至「不但是唐話，不拘什麼事體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學問或修為均須注重，於此，唐通事教材針對小說與善書之形式與觀點所做的模擬與變化，分別用以口語訓練與價值傳輸，成為唐通事養成之依據。

《鬧裡鬧》、《唐通事心得》與《唐話長短拾話》具有的說明議論特徵，也符應了白話小說與善書在敘事與思想上的庶民傾向，於說理方式與價值傳輸皆屬平易淺白，藉以強化勸善警醒之目的，此種承襲與新創為唐通事教材之特殊面貌，不僅提出有關通事養成的口才與學識，並訴諸道德修身的關懷。如此的敘事形式與價值內涵上之沿襲與融通，也記錄了時代風貌，或可展現明清時期中日通商交流所形成的文學傳播與交流之痕跡與相關影響。

四、結語

江戶時期由長崎傳入日本的中國古典小說與善書有其印刷與商業因素，然而此一流通背景，卻對當時中日通商所需的翻譯人才，亦即日本唐通事之教育產生影響，尤其唐通事往往具有的中國血統淵源，使其於古典小說與善書之取材、道德價值之沿襲上。更具有融合與新創的特徵。由於時代因素與文學交流的背景，唐通事教材之編寫具有古典小說與善書的色彩，相關的民間文化、價值觀點也因而影響唐通事教材之面貌。同時，參與傳播過程的唐通事，於此也表現其人之模擬與反省，由於唐通事之有意取材與新創，使唐通事教材在文字形式與價值內涵上皆有庶民傾向。唐通事除了利用白話小說之口語特徵以學習唐話，也接受此類通俗文本所蘊含的道德訓示，以做為通事養成教育的言行準則。藉由有意的模擬吸收、道德價值的傳輸，乃至文學形式或價值觀點因傳播過程中重新被引用、複製，使中國古典小說與善書於商品輸出貿易的層次，而擴大為具有文學、文化乃至價值意識等傳譯轉變的影響意義。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李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清〕名教中人：《好逑傳》，見殷國光、葉君遠編：《明清言情小說大觀》上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
- 〔清〕南岳道人：《蝴蝶媒》，見殷國光、葉君遠編：《明清言情小說大觀》中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
-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臺北：台灣文源書局，1979年。
- 〔清〕酌元亭主人編：《照世盃》，見張道勤、徐中偉、袁世碩、黃強校點：《西湖佳話、豆棚閒話、照世盃》，《中國話本小說大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見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見汪賢度校點：《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日〕六角恆廣編：《鬧裡鬧》，《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年。
- ：《小孩兒》，《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年。
- ：《養兒子》，《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年。
- 《唐通事心得》，寫本，長崎：長崎歷史博物館藏。年代未明。
- 《唐話長短拾話》，寫本，長崎：長崎歷史博物館藏。年代未明。
- 《瓊浦佳話》，寫本，日本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年代未明。

二、近人論著

- 石昌渝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
-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3年博士論文。
- 李時人、楊彬：〈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復旦學報社科版》3期，2006年。
- 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年。
- ：《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學生書局，2007年。
- 林慶勳：〈長崎唐話中對寬文二至四年（1662-1664）伊東走私事件敘述差異的探討：江戶時代唐通事養成教材研究之二〉，《東亞漢學研究》，長崎：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第4號，2014年。
- 林彬暉：〈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6卷5期，2007年。
- ：《域外漢語教科書編選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作品研究（14世紀至20世紀初）》，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分類說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許麗芳：〈長崎唐通事教材《瓊浦佳話》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學誌》20期，2010年。
- ：〈日本江戶時期唐通事教材《養兒子》與《小孩兒》的口語特徵與倫理關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海洋文化學刊》10期，2011年。
- 陳芷燁：〈明清社會勸善書及功過格的歷史作用及價值——以《太上感應篇》《太微仙君功過格》《文昌帝君陰騭文》為例〉，《廣西社會科學》5期，2008年。
- 萬晴川：〈明清小說與善書〉，《中國典籍與文化》1期，2009年。
- 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卷3期，1999年。
-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
- 〔日〕小川陽一：〈明代小說與善書〉，《漢學研究》6卷1期，1988年。
- 〔日〕木津祐子：〈「官話」の現地化：長崎通事書の二重他動詞「把」と琉球通事書の処置文〉，《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51號，2012年。
- 〔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4年。
- 〔日〕武藤長平：《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7年。
- 〔日〕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日〕奧村佳代子：〈唐話資料の二面性—内の唐話と外の唐話〉，《或問》6期，2003年。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and Moral Book on Tangtongshi Textbooks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1603-1867)

Hsu Li-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Japanese Tangtongshi (唐通事) textbook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colloquial language and values of civilians receiv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Critics have indicated colloquialism in Tangtongshi textbooks, and this paper continues the discussion by analyzing three textbooks for the Tangtongshi: *Naun Li Naun* (鬧裡鬧), *Tang Hua Chang Duan Shi Hua* (唐話長短拾話) and *Tang Tong Shi Hsing Der* (唐通事心得).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y receive and inherit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they rewrite the narrative of classical novels and deliver the values of civilian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lassical novels, Tangtongshi materials and Shanshu (善書 common books used to moralize civilians), expecting to show how Japan's Tangtongshi materials us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where Chinese books introduced to Japan influence how Japan's Tangtongshi textbooks are written.

Keywords: Tangtongshi, *Naun Li Naun*, *Tang Hua Chang Duan Shi Hua*, *Tang Tong Shi Hsing Der*,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